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吕家慧
(树仁大学 中文系,香港)

摘　要: 唐前乐府已形成汉魏、六朝两个传统,前者具有儒家所主张的“观风”的政治目的,后者则因内容趋于艳情而为后代所诟病。然六朝乐府除了“艳词”外,亦展现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描写兴趣,这实已开启有别于汉乐府的“观风”角度。排比中唐乐府可以发现,除了抨击时政的内容外,尚有为数可观的作品涉及地方土俗的书写,甚至以之作为诗歌主题。这批乐府作品拧合并改造了乐府在唐前的两条传统。它们一方面吸收并发展了六朝乐府的观察角度与创作手法,另方面扩充了汉乐府的“观风”内涵并扭转初唐以来“采诗”徒具形式的事实,强化其与“百姓讴谣”间的关系,从而使乐府的风俗主题得到创作上的正当性。

关键词: 乐府;观风;风俗;汉魏;六朝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4-0089-09

中唐乐府向来以抨击现实而为论者所关注,然排比盛、中唐之际的乐府作品,可以发现除了兴讽刺时的创作外,还有另一批作品对于地方风土风俗表现出浓厚的描写兴趣,这是前代乐府所罕见的主题。那么,这类作品在乐府自身传统下的发展脉络为何?背后是否牵涉到思想观念的转变?学界尚未有明确的讨论及回答。①

一、牵缀书土风:六朝乐府对于地方风土的关注

乐府诗在入唐以前已存在两个传统,一是上承“诗教”风刺一面的汉魏传统,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②的政治目的,大多保存于《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二是以艳歌艳词为主的六朝传统,大多保存在“清商曲辞”及部分“杂曲歌辞”当中,是白居易所批评的“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③之作。初唐乐府沿袭齐梁绮靡的路子,内容不出白氏所批评的“赞君美”或“悦君意”。四杰的乐府虽体现闻一多先生所谓“由宫廷走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的倾向,但现实的针对性不强。盛唐王维、高适、王昌龄发展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但更多地歌颂盛唐的武功气象。中唐以后,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集中创作乐府,试图在理念的层次上直接继承《诗经》的“风刺”传统,甚至否定汉乐府的价值,故有“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④之说。但选择以“乐府”而非其他诗体干预政治,还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汉乐府观风知俗观念的继承。不仅如此,中唐乐府诗人吸收了六朝的部分传统。六朝乐府在男女相思怨别的主题外,还展现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这是“观风”的新视角,显示观风观念的变化,由

收稿日期:2016-03-16
作者简介:吕家慧,女,台湾台中人,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① 刘航《中唐诗歌嬗变的民俗观照》(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 年版)从风俗的角度观察中唐诗歌史,并从中发掘风俗诗歌的文学史价值,但对于风俗题材在乐府内部的发展则尚无涉及。李建昆《从张籍乐府看唐代民间风情》(台湾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第三届通俗文学与雅正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 年版)指出张籍乐府诗从民俗的角度出发,呈现特殊的美感与趣味,并借此体察中唐民生哀乐。李氏的论述着重在对张籍乐府的分析,对于风俗作为一个题材何以会在中唐兴起则没有提出解释。

② 《汉书》卷 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08 页。

③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443 页。

④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第 443 页。

此所发展出的新兴题材以及表现手法深刻地影响中唐的乐府创作。可以说,新乐府在观念上高举《诗经》的旗帜,批评六朝乐府甚至汉乐府,但事实上,其既继承了汉乐府的传统,也同样吸收了六朝乐府的精神。其继承汉乐府批评六朝乐府者,学者言之已多,而其继承六朝乐府者则鲜有人论及,兹试论之。

首先,就乐府命题方式来看,六朝乐府有相当数量是以“地方”命名。诸如《吴歌》《襄阳乐》《襄阳曲》《雍州曲》《石城乐》《寻阳乐》《寿阳乐》《三洲歌》《江陵乐》《那呵滩》《江南曲》《西洲曲》《荆州乐》《南郡歌》《长干曲》《齐讴行》《吴趋行》《会吟行》《邯郸行》《常林欢》等,都是以“地方”为题,直接或间接叙写地方风物,数量远超汉魏旧题。《乐府诗集》所列与地名相关且出于汉魏乐府题的只有《江南》《豫章行》《陇西行》《蜀道难》《泰山吟》及《东武吟行》,其中《泰山吟》和《东武吟行》据左思《齐都赋》注云:“皆齐之土风。”①或涉及地方风土,但这些作品在“相和歌辞”中只占很少的数量。班固虽然宣称乐府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但今存汉乐府却甚少涉及地方风土的描写,我们很难知道赵、秦、楚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样貌。汉魏乐府虽以“观民风”为出发点,但“存问鳏寡,览观风俗”②的焦点往往在于凸显“人伦”关系。因此汉乐府中最能反映庶民声音的作品如《东门行》妻子对于丈夫的规劝、《病妇行》病妇对丈夫的叮咛、《孤儿行》兄嫂对孤儿的虐待等,都是以伦常的扭曲控诉社会对于底层人民的压迫,对于民间生活的描写却甚为稀少。一首典型的汉乐府一般截取生活的单一场面,以人物的独白或对白进行叙事,因此我们很难知道事件的前因后果,故事人物的生活环境如何?以什么产业维生?为何会遭受如此困境?这些细节往往必须靠读者自行想象,填补故事的空白。

六朝这批以“地方”命题的乐府则可见显著的地方特征。《石城乐》描写石城少年的日常活动。《那呵滩》“多叙江陵及扬州事。”③陆机《齐讴行》:“备言齐地之美。”④《吴趋行》乃“吴人以歌其地”。⑤《会吟行》“其致与《吴趋》同,会谓会稽”。谢灵运就曾作此题表达对于“牵缀书土风”⑥的写作兴趣。相对于汉乐府关注人伦而忽略事件的时空背景,六朝乐府在地方风土的框架下展现对于百姓生活的书写兴趣。

其次,六朝乐府亦表现对于百姓营生方式的高度关注。《采桑度》《采桑》《拔蒲》《作蚕丝》《采莲曲》《采菱歌》以江南的营生活动为题。“金钩全出树,桑条半隐篱。欲教见纤手,攀取最高枝。”⑦“上水郎担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江当柱。”⑧无论是对采桑活动或江南水上生活的描写,都反映长江流域的生活特征及江南百姓的营生活动,这也是汉乐府所罕见的表现内容。

六朝乐府以男女恋歌为主要内容,但男女恋歌又往往以南方风土习俗及营生活动作为叙事背景,这就让乐府的写作根植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子夜四时歌》“春倾桑叶尽,夏开蚕务毕。昼夜理机缚,知欲早成匹”⑨,在营生活动中寄托相思。宋武帝《丁督护歌》“督护初征时,依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⑩及萧子显《南征曲》“棹歌来扬女,操舟惊越人。图蛟怯水伯,照鹢竦江神”⑪,反映民间的传说与信仰,较汉乐府更全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卷 41,第 608 页。
② 《汉书》卷 8,第 258 页。
③ 《乐府诗集》卷 49,第 713 页。
④ 《乐府诗集》卷 64,第 932 页。
⑤ 《乐府诗集》卷 64,第 934 页。
⑥ 《乐府诗集》卷 64,第 935 页。
⑦ 周弘正:《采桑》,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续集,卷 1,第 85 页。
⑧ 《襄阳乐》,《乐府诗集》卷 48,第 703 页。
⑨ 《乐府诗集》卷 44,第 646 页。
⑩ 《乐府诗集》卷 45,第 659 页。
⑪ 《南征曲》,《乐府诗集》卷 74,第 1053 页。

方位地展现百姓的生活状态。梁武帝《子夜四时歌》及李白的拟作最能说明汉到六朝乐府的创作视角的转变。武帝“含桃落花日,黄鸟营飞时。君住马已疲,妾去蚕已饥”①,是一首典型的男女恋歌,但主人翁没有长聚的原因在于“妾去蚕已饥”,思妇是以养蚕维生,因为负责蚕桑之事,所以无法抛下一切与意中人相会。这就将相思的主题置于日常劳作的框架中,而不同于汉乐府仅截取单一对话场景却模糊人物背景的叙事方式。李白“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②,正是将梁武帝笔下的采桑女嫁接到汉乐府《陌上桑》的主人公身上。汉代罗敷藉由夸耀自己的夫君来拒绝使君的引诱,她对丈夫的坚贞不二凸显的还是夫妻间的伦常关系。然李白“蚕饥妾欲去”承梁武帝“妾去蚕已饥”而来,以女子对于产业的挂记作为托词,这是汉乐府未曾展示的线索,亦可见六朝乐府的新视角对于唐人的影响。李白实际上是以六朝乐府的惯用手法将汉乐府的经典作品重新诠释一遍,让百姓日用进入乐府叙事,并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脚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朝乐府已开启有别于汉乐府“观民风”的“新观风”角度。这一新角度与中唐新乐府可谓是视野相合,前后相通。

二、陈诗观民风:风俗题材在中唐乐府中的突出表现

六朝乐府旧题在入唐后仍有许多文人拟作,如张祜《襄阳乐》,李白《襄阳歌》,李白、刘禹锡《荆州歌》,崔国辅、施肩吾、李白和李端的《襄阳曲》等。同时,这种以地方为题的命名模式也为唐人所继承,李白《巴女词》,杜甫《夔州歌》,刘湾《云南曲》,于鹄《巴女谣》,王建《荆门行》,张籍《湖南曲》《成都曲》《湘江曲》《泗水行》,刘禹锡《纪南歌》出自古题《荆州乐》,另又有《宜城歌》《顺阳歌》《龙阳县歌》《淮阴行》。这批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乐府题大多也是采用“歌”“曲”等歌辞性题目,这又与以南朝乐府为主的“清商曲辞”以及部分“杂曲歌辞”的取向一致③,延续了南朝乐府的命题方式与地方书写传统。

唐人也拓展了六朝旧题所涵盖的营生内容,杜甫《负薪行》《最能行》《蚕穀行》《观打鱼歌》,元稹《采珠行》《织妇词》和《田家词》,刘禹锡除了古题《采菱行》外,还有新题《插田歌》《畬田行》,王建有《簇蚕辞》《赛神曲》《当窗织》《织锦曲》《田家行》《水夫谣》《海人谣》,张籍有《野老歌》《樵客吟》等。尽管六朝往往是以劳动背景中的男女恋歌为主题,但“语欢稍养蚕,一头养百堰。奈何黑瘦尽,桑叶常不周”“伪蚕化作茧,烂熳不成丝。徒劳无所获,养蚕持底为”④,亦稍涉及百姓劳动所遭遇的困境,可见六朝乐府除了在风土的框架中叙写男女恋歌,也将视角转移到劳动本身。中唐乐府除了对劳作本身的兴趣外,更进一步以生民劳作的辛劳暗示官府对于百姓的诛求,杜甫“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⑤、元稹“海波无底珠沈海,采珠之人判死采”⑥、王建“输官上顶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⑦等分别从夔州女、珠人及织女的角度出发,尖锐地指出劳动者辛勤工作却要将所得全部上交官府,甚至牺牲自已的生命。这种批判的强度首见于中唐,但

---

① 《乐府诗集》卷 44,第 650 页。

② 《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351 页。

③ “ 相和歌辞的汉魏晋古题中,‘行’诗有五十八题,二字至五字题有十九题。其余‘曲’占两题,‘叹’占一题,‘吟’占五题。鼓吹曲辞中二字至五字题有十九题;杂曲歌辞中,‘行’诗有三十四题,二至五字题九十六题,‘篇’二十七题,‘曲’三十一题,‘歌’九题,‘吟’八题,‘怨’两题。其中有些‘曲’、‘篇’和三字题在南朝至唐代被改成‘行’诗。而主要是保留南朝乐府民歌的清商曲辞中则有‘歌’二十六题,‘曲’十八题,‘乐’十二题,没有‘行’诗。”可见“歌”“曲”“乐”等歌辞性题目以南朝为最大宗。见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0 页。

④ 《采桑度》,《乐府诗集》卷 48,第 709 页。

⑤ 《负薪行》,《杜诗详注》卷 15,第 1285 页。

⑥ 《采珠行》,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 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80 页。

⑦ 《当窗织》,《王建诗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8 页。

以生民劳动作为主题或烘托主题的创作手法也可以说是中唐乐府在六朝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

中唐诗人继承六朝的写作手法并进一步转化其观察视角。《江南曲》"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①,此题在六朝的发展除了梁简文帝"歌游戏"外,入唐后宋之问、刘昚虚、丁仙芝、刘希夷不脱以"芳晨丽景"写男女恋歌的传统。因此宋之问、刘昚虚要给"懒结茱萸带,愁安玳瑁簪""玉手欲有赠,徘徊双鸣珰"②一联特写,刘希夷《江南曲》八首要以翡翠、朱服、金阁、珠楼、芙蓉、金花等意象入诗,形塑江南女子高贵美丽的形象。如果说其三"朝游含灵果,夕采弄风苹"③尚借"灵果"等珍奇的事物衬托"白苹",展现思念的真诚④,那到中唐于鹄"偶向江边采白苹,还随女伴赛江神。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⑤,江南风俗进入诗歌的视野,诗人不再延续南朝以来瑰丽的江南想象,而更贴近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赛神""卜巫"等民间信仰侧写少女心事,见观察视角的转移。

张籍的拟作:"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苎。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⑥"吴姬"是南朝以来"江南曲"的主角,但张籍一笔带过,他更感兴趣的是具体的风土。"虫蛇"入诗在此前的"江南"书写中是无法想象,也无法跟"欢乐多"做系连,《江南曲》对于庶民生活的关注说明此题从"汉世街陌讴谣"的"江南可采莲"走向南朝华美的江南想象,到中唐再转回庶民生活的痕迹。《春江行》"巴女曲也",梁简文帝诗描写巴女在大堤上与恋人相别,篇幅短小但亦足以让读者知道事件的具体位置。此题在张籍手上进一步发展⑦,脱离"巴女曲"的原始意义而将诗歌的背景转移到长江下游的金陵一带。描写女子要将染制完成的春衣送到江北予夫婿,趣味全在女子于诗末私自在江头祭祀水神的活动。是以女子"私向江头祭水神"这种根植于庶民生活中的民俗活动体现女子的幽微心事,希望长江水平,让她得以早日和夫婿团聚。同样是以男女相思为主题,中唐诗人的描写角度更贴近百姓的生活,体现对于民间风俗的细腻描写。

《采莲曲》曾被梁简文帝、梁元帝、刘孝威、朱超、沈君攸、吴均、陈后主、卢思道、殷英童、崔国辅、徐彦伯、李白、贺知章、王昌龄等多人拟作。无论是梁元帝"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⑧或是王昌龄"吴姬越艳楚王妃,争弄莲舟水湿衣"⑨,都可见诗人的关注点并不在于"采莲"作为一种营生方式,而是南朝宫体诗式的刻画,描绘采莲女子的妖娆姿态。中唐鲍溶今存两首《采莲曲》则与前作稍有不同,第二首"艳歌笑斗新芙蓉,戏鱼住听莲花东"⑩明显借鉴汉乐府《江南曲》"鱼戏莲叶东"⑪,就不同于南朝以降的艳情路数;第一首"殷勤护惜纤纤指,水菱初熟多新刺"⑫,已涉及采莲女的劳作姿态,对于女子劳作细节的描写前承梁代诗人朱超同题乐府"洗手畏菱滋"的视角,只是朱作尚未脱去对于女子"艳色前后发"的描写兴趣。"采莲"作为百姓的劳动方式在张籍同题作品⑬中得到进一步的描写,"试牵绿茎下寻

① 《乐府诗集》卷 26,第 384 页。
② 《乐府诗集》卷 26,第 386 页。
③ 《乐府诗集》卷 26,第 387 页。
④ 《乐府诗集》卷 26,第 387 页。
⑤ 《乐府诗集》卷 26,第 388 页。
⑥ 《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13 页。
⑦ 《张籍集系年校注》,第 822 页。
⑧ 《乐府诗集》卷 50,第 731 页。
⑨ 《乐府诗集》卷 50,第 734 页。
⑩ 《乐府诗集》卷 50,第 735 页。
⑪ 《乐府诗集》卷 26,第 384 页。
⑫ 《乐府诗集》卷 50,第 735 页。
⑬ 《张籍集系年校注》,第 68 页。

藕,断处丝多刺伤手”对于女子手部的特写反映的是采莲女的劳动实况。此联的创意可说与朱超、鲍溶等一脉相承,只是张籍对于采莲作为一种劳动方式有更加深刻而真实的观察,保留六朝以来的刻画技巧,但却脱去其中艳情的描写。同时,张诗“白练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钗妆梳浅”,写女子装束干练,去除一切多余的饰物,刚好和陈后主“随宜巧注口,薄落点花黄。风住疑衫密,船小畏裾长”①形成一组有趣的对照。后者的装束根本不宜从事任何劳作,盛装打扮的女子只是被观赏的对象而非真正的劳动者。而从陈后主到张籍,也可看出《采莲曲》一题从“艳词悦君意”回归“陈诗观民风”的转向。

刘禹锡《淮阴行》并引曰:“古有《长干行》,言三江之事悉矣。余尝阻风淮阴,作《淮阴行》,以裨乐府。”②说明新题《淮阴行》受到古题《长干行》的影响。《长干行》古辞短小但亦涉及长干生活的侧面并承六朝乐府之传统,喜欢以女子的声口叙事,李白的《长干行》就是一首爱情诗。刘禹锡《淮阴行》五首则更直接地书写淮阴风土,其一“簇簇淮阴市,竹楼缘岸上。好日起樯竿,乌飞惊五两”③,展示百姓的具体生活。直接书写地方风土习俗“以裨乐府”可说是以创作实践丰富汉乐府“观民风”的理想。

除了古题乐府,新题乐府或歌行也体现中唐诗人对于地方风土习俗的关怀。皎然《顾渚行送裴方舟》、顾况《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张籍《江村行》《樵客吟》《牧童词》、王建《赛神曲》《田家行》《簇蚕辞》《荆门行》《寒食行》、刘禹锡《竹枝词》《畬田行》《踏潮歌》、孟郊《弦歌行》等都涉及百姓生活的诸面相,他们与六朝《清商曲辞》及《杂歌谣辞》在命题及题材上具有亲缘关系。中唐乐府诗人尽管在观念上反对六朝传统,但落实在写作上依然受到六朝的影响,只是观察视角有异于六朝的男女恋歌模式,更关注生民活动的本身。

但是,中唐乐府中所描绘的风俗,并非中唐才开始出现,此类题材为何不受初、盛唐诗人的关注,却大量出现在中唐诗人的笔下,成为中唐乐府“伤民病”之外的另一主流?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三、赋之以俟采诗者:中唐风俗观念的变化与采诗理想的复兴

中唐大量出现表现地方风土或风俗的乐府与中唐对于观风观念的转变关系密切。观念的变化使得当代的地方风俗得以出现在诗人笔下。

“观风”之观念亦非始自中唐,初盛唐已有之。但对初盛唐人而言,所谓“观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李峤《论巡察风俗疏》指出“巡察风俗”的内容在于“察吏人善恶,观风俗得失”,而察观的标准又在于“汉之六条”。④ “六条”⑤中有五条都以“二千石”的德行作为考察的对象,余一条则在压制地方豪强。六条以“察吏人善恶”为重,或有涉及“观风俗得失”者,但恐怕也只是作为考察地方吏治的背景罢了。李峤的看法与汉乐府的设置目的是相通的。汉乐府作为中央政府的采风机构,司职收集民间讴谣,但因为“乐府”作为官署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民间歌谣来考察地方吏治,则民间歌谣或有以地方风土习俗为主题者,但并不为官署的“乐府”所重视。这种制度性因素就导致其所采集的乐府作品以对地方长官的“美刺”以及鳏寡孤独处境的揭示为主,而罕见“牵缀书土风”的内容。六朝乐府虽涉及地方风土的描写,但往往以男女恋歌为创作主体,甚至不乏艳情的内容,这便与汉乐府机构设置的目的及理想渐行渐远了。

初、盛唐人之观“风俗得失”要上接汉代传统,其内容“准汉六条”即是明证,其目的也离不开“察吏人善恶”。玄宗:“古者黜陟幽明,廉问风

① 《乐府诗集》卷 50,第 732 页。
②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书社 2003 年版,第 17—18 页。
③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 18 页。
④ 《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卷 247,第 1102 页。
⑤ 《汉书》,颜师古注,卷 19 上,第 742 页。

俗,匪惟察吏,亦以恤人。”①观风的重点就是“察吏”和“恤人”;孙逖《授裴宽河南尹裴伷先蒲州刺史制》:“八使观风,咸推课最。”②“课最”即是官员考核最优者,则观风所观者当然是官员的表现。陈子昂《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铭》“下车问俗……抑浮窳,禁蠡食”③以及苏颋《幸新丰及同州敕》“见彼耆耋,问其疾苦,察长吏之政,恤黎甿冤,盖所以展义陈诗,观风问俗”④,基本还是将观察落实在地方长官能否稳定境内人口、打击豪强、存恤鳏寡、澄清狱讼等层面上,大体可与“六条”相应,反映汉代以来对于良“二千石”的期待。上述记载涉及河南尹、梓州长史或是同州长官,但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地方长官所会面对的地方差异及其应变措施。

一方面初盛唐之观风俗以政治治理为中心,另方面,更是要通过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此观念之基础是认为当代的地方风俗不合乎传统的礼教,缺乏应有的道德价值。魏徵言“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⑤,张　称“古之天子,制礼以安人;昔者明王,作乐以崇德。移风易俗,成孝敬而厚人伦”⑥,邢巨应“文辞雅丽科”以“礼乐”为“先王所以美教化”的关键⑦,都是嫌当代风俗不美,人伦不厚,需要礼乐教化以改变之。由此,“观风俗得失”的目的除了“见彼耆耋,问其疾苦”外,还在于地方长官要能施行礼乐,改变风俗。因此张说称美凉州长史元仁惠“我有礼乐,达于山川鬼神……观人设教,异邑同风”⑧;正强调以兴礼作乐的方式改变地方风俗。裴行俭《下建州教书》“礼典既阙,风俗何观?”⑨卢怀慎《陈时政得失疏》“礼义未能兴行,风俗未能齐一,户口所以流散,仓库所以虚空。”⑩前者把国家“礼典”视为地方“风俗”的内容,后者甚至把户口流散、仓廪虚空归因于礼义不兴、风俗未齐。由王朝礼乐而致“风俗齐一”是地方吏治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这种观念与时人只凸显“上以风化下”而忽略“下以风刺上”的教化立场是相通的。

初盛唐人固承认“风俗”是地方吏治的根本,但他们对“观风问俗”的理解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即地方长官对于鳏寡孤独的体恤或者对地方豪强的打压,这是“汉六条”的延续⑪;另方面是道德上的,即发现风俗之缺失,通过兴礼乐而改变风俗,这是王朝“制礼安人”“作乐崇德”观念的下移。但安史乱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中唐人不再视地方风俗为负面的无条件改造对象,而是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承认风俗的差异性与现实合理性乃是政治治理及道德教化的基础与前提。高郢《礼部试策五道》指出“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⑫,以“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为政教的基础。这与初盛唐之移易风俗之说大相径庭。

白居易答《礼部试策五道》⑬明确指出,先王的政教要建立在“任土辨物,简能易从”的基础上。“反地利,违物性”,追求同教化、一风俗,就会导致“易俗失宜”“匮神废礼”,反不能达到政教

---

① 《全唐文》卷 25,第 119 页。

② 《全唐文》卷 309,第 1389 页。

③ 《全唐文》卷 214,第 957 页。

④ 《全唐文》卷 254,第 1137 页。

⑤ 王福畤:《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全唐文》卷 161,第 725 页。

⑥ 《太乐令卢庆状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代不相袭礼请改圣朝乐名大象天下往极为号又应国姓》,《全唐文》卷 174,第 780 页。

⑦ 《全唐文》卷 301,第 1350 页。

⑧ 《唐故凉州长史元君石柱铭并序》,《全唐文》卷 232,第 1038 页。

⑨ 《全唐文》卷 162,第 730 页。

⑩ 《全唐文》卷 275,第 1235 页。

⑪ 汉乐府是以考察二千石和体恤鳏寡孤独为采诗标准。见葛晓音:《论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原因和表现艺术》,《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社 1990 年版,第 3—15 页。

⑫ 《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25 页。

⑬ 《白居易文集校注》,第 426 页。

的目的。相对于初、盛唐将“乘时设教”的重点放在“以义制事,以礼制心”①,亦可见唐人对“教本”的看法转向强调“任土制宜”的重要性。文人开始注意地方土俗与地方吏治的关系,愿意花更多的篇幅描述地方特色,对地方风土风俗有强烈的书写兴趣。大历七年常衮已然强调“因时以设教,便俗以立防”②;权德舆突出齐抗能“因习俗之便安”③;柳宗元详述“越人信祥而易杀”④的陋习;韩愈说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的时候“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⑤等,都说明中唐以后的文士对于异地风俗的关注。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说得更加清楚:“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欢乐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⑥既然一方有“不同教化”,那么自然不宜再以一套统一的礼乐制度规范之。

了解与尊重地方风俗的差异性与合理性,并且认为这是治理与教化的前提和基础,“观风”的内涵由是扩大到地方的风土民情上,这种观念上的变化甚至导致时人对于诗歌的诠解产生转变。白居易《策林六十九·采诗》:“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⑦“广袖高髻”出自汉童谣“城中好高髻”⑧,是少数保存东汉风尚的谣辞,现在白居易把它置于一串对《诗经》的论述之后,一方面说明书写风俗的乐府是上承《诗经》传统;另方面也让“观风”超出“伦理”的范畴,风俗进入创作的视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诗经·黍离》的论述,毛诗解释:“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⑨但在白居易的理解中,这首诗恰可以证明“时和岁丰”。用以起兴的场景反倒成了“观风”的对象。《禾黍》焦点的转移可以作为风俗题材兴起的象征,在正统儒家的理解当中,周大夫是这首诗的主角,他所关注的是“宗庙宫室”的颓败,从而生发家国之思,但在白居易眼里,“彼黍离离”证明是年丰收,它更直接地与生民相关,宗室则可省略不谈。刘禹锡在《竹枝词》并引中说“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⑩明确地将这类创作上接“国风”,说明写风土风俗的作品也有宗经的正当性。晚唐陆希声《北户录序》明确指出“诗人之作,本于风俗。……自非观化察时,周知民俗之事……则安足以蕴为六义之奥,流为弦歌之美哉”?⑪ 把“民俗之事”涵盖于“风俗”的范围内,并承认它有“六义”的价值。风俗的描写获致“宗经”的正当性。

同时,“采风”或“采诗”的理想被中唐诗人不断提出。《新唐书·礼乐志》载天子巡狩“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风俗”⑫,但其“采诗”与汉人有异,所采并不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得⑬,与其说是“采诗”,不如说是“献诗”。是故白居易和刘禹锡在太和二年都曾作“观稼”诗,目的在“谨书盛事以俟采诗者”⑭,内容但以颂圣为主。尽管中唐以后仍可见这种徒具

① 张说:《对词标文苑科策》,《全唐文》卷 224,第 998 页。
② 《大历七年大赦天下制》,《全唐文》卷 415,第 1780 页。
③ 《唐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宾客赠户部尚书齐成公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 499,第 2252 页。
④ 《柳州复大云寺记》,《柳宗元全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52 页。
⑤ 《柳子厚墓志铭》,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昌黎文集汇校笺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407 页。
⑥ 《全唐文》卷 597,第 2672 页。
⑦ 《白居易文集校注》,第 1599—1600 页。
⑧ 《后汉书》卷 24,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853 页。
⑨ 《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252 页。
⑩ 《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 317 页。
⑪ 《全唐文》卷 813,第 3791 页。
⑫ 《新唐书》卷 14,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35 页。
⑬ 左汉林:“唐代天子巡狩中的太常卿采诗实际上是一种复兴古礼的行为。在先秦和汉代,天子巡狩以及在巡狩中采诗已经成为之种制度,唐代的太常卿采诗明显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29 页。
⑭ 《白居易诗集校注》,第 2029 页。《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 465 页。

形式的“采诗”活动,但“陈诗采风俗”①作为一种时代的声音还是广泛地出现在诗人的个人创作中。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乐府大家,白氏真正主张的是“采诗以补察时政”,新乐府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道州民》都已涉及唐世风俗的叙写。刘禹锡《淮阴行》“以俾乐府”其实就是一种采诗的思路。又其《采菱行》和《插田歌》明确表示要赋之“以俟采诗者”。这就进一步把与六朝乐府有亲缘关系的乐府赋予汉乐府的政治意义,并在题材上扩充之了。

这种“采诗”的思路为中唐文人所共有。② 随着中唐文人纷纷到地方就职,送行者常期待所送者在地方因为施政得当而让当地民众作歌谣以颂之,这预设的正是“采诗”的可能。钱起“衣催莲女织,颂听海人词”③,李端“太守新临郡,还逢五裤歌”④以及刘商“人咏甘棠茂,童谣竹马群”⑤,都依循百姓歌咏地方官的套路。那么百姓何以要歌颂地方官呢? 如果说韩翃“使者下车忧疾苦,豪吏销声出公府”⑥的思路还是延续“汉六条”的标准,那么耿湋“之官逢计吏,风土问如何”⑦,司空曙“晓樯争市隘,夜鼓祭神多”⑧,以及元稹《茅舍》详述韦丹对楚地土俗的改造等⑨,都将官员的治绩与其对地方风土的掌握相结合,强调的是对于百姓生存环境及生活细节的关注。

此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在表达某州县长官的“政教得失”,背后还是体现“采诗”的观念。耿湋因王公“凿井便溉”,解决“覃怀旧水咸卤,人多祓患”的问题,作《甘泉诗》以“美良牧也”。欧阳詹《益昌行》记陆长源牧利州“人安俗阜”,故“钦所以美,作诗一章”。⑩ 白居易《代州民问》、元稹《代杭民答乐天》、李贺《巴童答》干脆代州民发声,扭转官员“观风”,庶民“歌谣”的路数,从“观风”“采风”者变成创作“风”诗的人。这类型的创作未见于初、盛唐却为中唐文人所发掘,这都说明汉代“观风”或“采风”的传统在中唐复兴。

各类文体中,乐府的起源本与“采诗”或“采风”的理想直接相关,当采风的传统被再次强调,“观风俗得失”不再依附于“察吏人善恶”或王朝礼乐的落实,而是更直接地与百姓生活的具体情况相关,这就让与“观风俗”最直接相关的乐府产生创作上的转变。中唐之所以出现大批书写风俗的乐府,背后正涉及唐人在观念上的转变。

总之,乐府到唐代已形成两个传统,一是要“观风俗,知薄厚”的汉乐府,二是以男女恋歌为主的南朝乐府。中唐新乐府“病时之尤急”者即意在拓展汉乐府“伤民病”的传统,但梳理中唐乐府的创作情况,这类乐府常以地方风土或百姓的日常生活为框架,此又与南朝乐府的表现方式前后相承。因此白居易《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都涉及唐世百姓的生计活动;《牡丹芳》《时世妆》《井底引银瓶》则书及当世风尚与婚俗;《城盐州》《道州民》又见地方描写,这都是汉乐府所罕见的表现手法却能在南朝乐府中找到创作的线索;另一类乐府则与“民病”没有直接关联,其兴趣更在地方风土风俗的本身,如上文刘禹锡诸人诸作所示,更可见其与南朝乐府的亲缘关系,后者是其创作倾向的先导。中唐乐府对于地方风土习

---

① 陆龟蒙:《读襄阳耆旧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全唐诗》卷 617,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108—7109 页。

② 除白居易和刘禹锡外,张籍、王建、元稹等人亦有创作乐府以待采诗的主张。柳宗元《捕蛇者说》要“ 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永州铁炉步志》“予以为古有太史,现民风,采民言。若是者,则有得矣。嘉其言可采,书以为志。”连古文都被赋予“采风”任务了。

③ 《送任先生任唐山丞》,《全唐诗》卷 238,第 1161 页。

④ 《送张少府赴夏县》,《全唐诗》卷 285,第 3258 页。

⑤ 《送卢州贾使君拜命》,《全唐诗》卷 303,第 3456 页。

⑥ 《送巴州杨使君》,《全唐诗》卷 243,第 2732 页。

⑦ 《送海州卢录事》,《全唐诗》卷 268,第 2292 页。

⑧ 《送夔州班使君》,《全唐诗》卷 292,第 3310 页。

⑨ 《元稹集校注》,第 76—77 页。

⑩ 《全唐诗》卷 349,第 3900—3901 页。

俗的描写兴趣涉及时人对“观风”理解的变化。初、盛唐文人对“观风”的看法一则延续“汉六条”,主要的观省对象是地方“二千石”;二则以地方官在地方兴礼作乐的办法移风易俗。到中唐“观风”被落实到具体的风土风俗上,这就对乐府书写风俗产生正面的影响。乐府作者或者聚焦风俗本身,或者将生民哀乐置于风俗的具体背景中。最后,随着中唐文人到地方任职的机会大增,“观风”或“采风”的意图逐渐于文人的创作中发声,而“乐府”的源头本与“观风”或“采风”的理想密不可分,这也推动中唐乐府在六朝的基础上往地方风土风俗的题材转型。

On the Rise of the Custom Theme in the *Yuefu* Poems of the Mid-Tang Dynasty

LU Chia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Yuefu* (乐府) had already formed two traditions, i. e., the style of the Han-Wei Period and the style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 former had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observing the customs" advocated by the Confucians while the latter was criticized by the poets of later dynasties due to its erotic contents. However, the *Yeufu* poems of the Six Dynasties except some erotic ones,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ocal customs, which formed a new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 of "observing the customs" shown in the *Yuefu* poems of the Han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eir criticism of the current politics, many *Yuefu* poems of the Mid-Tang Dynasty wrote about the local customs, and even took the local customs as the poetic theme. The *Yuefu* poems of the Mid-Tang Dynasty integrated and transformed the two traditions of *Yuefu*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Meanwhile, they extend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observing the customs" in the *Yuefu* poem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reconstructed the tradition of "poem collecting" (采诗), which had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from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Yuefu* poems of the Mid-Tang Dynasty intensifie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folk songs and ballads, thus justifying the custom theme of *Yuefu* in its creation.

Key words: *Yuefu* (乐府), observe the customs, custom, Han-Wei Period, Six Dynasties

(责任编辑　郑　园)